

文史知识文库

德國的漢學研究

張國剛 著



文史知识文库

德国的汉学研究

张国刚 著

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华晓林

文史知识文库

德国的汉学研究

张国刚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2¹/₂印张·2插页·154千字

1994年7第1版 199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8.00 元

ISBN 7—101—01155—1/G·43

写在《文史知识文库》之前

这套书本来是以“文史知识丛书”的名义出版的，现在改成“文史知识文库”。“丛书”改成“文库”，目的是使这套书容量大一些。把这套书编得更充实、更丰富，不仅容纳《文史知识》已经刊发过的较好的内容，还要容纳《文史知识》未能刊发的内容。我们的计划是深入浅出地、重点而又系统地介绍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丰硕成果。

我们的时代日新月异。科学技术革命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国人民重振雄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祖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酝酿着新的崛起，新的振兴。

在这一巨大变革中，在计算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超导体、遗传工程等纷至沓来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深深感觉到无所不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如此的丰厚，以至于我们伴随着一项现代化工程的伟大胜利，几乎都要想起我们的前人，想起为我们编写了中华民族灿烂篇章的人们。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六朝的丰碑巨制、韩柳欧苏的大块文章、明清之际的人生画卷，无不表现了对社会国家的情怀，对宇宙世界的期待。这千古风流人物的搏斗，相互辉映，激荡交融，造成了光华灿烂的中国，博大久远的中华民族传统。这是

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民族凝聚、发展、强盛的力量。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总离不开我们站立的祖国大地。我们都是伟大祖国的儿女，对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对我们祖先繁衍发展的土地，怀着深切的挚爱之情。爱她，了解她，同时研究她；在了解她、研究她的过程中渗透着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信念。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重新崛起的决心，把祖国的传统文化放到整个世界文明的背景之中，我们一定会更准确地找出精华，区分糟粕，在看来杂乱无章、盲目被动的历史表象中，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为我们今天的创造活动服务，为我们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服务。

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作者和我们一起编好这套文库，共同去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2137/08

目 录

一	引言	1
二	传教士时代的德国汉学	10
	(一)从汤若望到魏继晋	10
	(二)从米勒到门泽尔	12
	(三)从莱布尼兹到歌德	15
三	筚路蓝缕的先驱——十九世纪的德国汉学	20
	(一)业余爱好者的汉学	21
	(二)东方学中的汉学	23
	(三)学术性的汉学	26
四	世纪之交的转折——德国汉学学科的建立	30
	(一)柏林东方语言研究所	30
	(二)来自各方的呼唤	32
	(三)汉学学科的建立	35
五	卫礼贤和法兰克福“中国学社”	40
	(一)悠游于中国学者之间	40
	(二)法兰克福“中国学社”	42
	(三)鞠躬尽瘁译介儒家经典	45
六	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福兰阁和佛尔克	49
	(一)福兰阁的中国通史研究	50
	(二)佛尔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53

七	土生土长的“莱比锡学派”——孔拉迪及其弟子们	56
	(一)孔拉迪和莱比锡学派	57
	(二)出身莱比锡的孔门弟子	59
八	大墙外的汉学家——查赫与库恩	65
	(一)查赫的中国古典诗文翻译	65
	(二)库恩的中国古典小说翻译	67
九	从柏林到北京——西来取经与东行求法	72
	(一)海尼士和柏林的中国学	73
	(二)西行“取经”的中国学者	75
	(三)留学北京的德国汉学家	78
十	战后的残局与汉学的重建	82
	(一)战后的残破局面	82
	(二)人才的严重流失	84
	(三)汉学的恢复和重建	86
十一	从“三分天下”到“诸侯称霸”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德国汉学	91
	(一)傅吾康的明清史与近代史研究	91
	(二)福赫伯的中国中古史研究	94
	(三)艾克斯以来的东德汉学研究	96
	(四)福克斯、海西西的明清、蒙元研究	100
	(五)霍福民、艾士宏的文史研究	103
	(六)葛林、德博和鲍吾刚的文史哲研究	105
十二	“中国热”时代的汉学	112
	(一)“中国热”的几点特征	112
	(二)八十年代以来的几个研究热点	116

(三)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与未来研究趋势·····	122
十三 今日大学的汉学系·····	127
(一)汉学系的一般情况·····	127
(二)奥地利的汉学系和汉学研究·····	131
(三)瑞士的汉学系和汉学研究·····	133

附录

1. 德语国家中国学家小传·····	136
2. 德语国家的大学汉学系简介·····	195
3. 德国汉学研究丛书简介·····	207

一 引 言

(一)

东西方文化通过互相交流来加深了解,取长补短,如今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应该说是无可争辩的共识了。文化的交流有种种渠道和方式:物质文明的自然碰撞,思想精神和相互汲取,哲人式的融会贯通,老百姓的兼收并蓄,媒体的道听途说,专家的介绍研究,等等。其中专门家对异国文化和历史的介绍与研究,就本文的主题来说,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介绍与研究尤其具有重要性。

外国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中国的月亮也不比外国的圆。大概可以盖棺论定。但是,当莱茵河畔星光灿烂之时,扬子江上也许正霞光满天。从西方看东方和在东方看东方就是不一样,反之亦然。正像一个人打量自个儿,跟别人观察自己往往有所差别,中国人研究中国与外国人研究中国势必也有所不同。同是外国人,东洋人眼中的中国与西洋人的中国图象也不会雷同。因此,当今的中国学实际上又有中国的“国学”、日本的“支那学”、西方的“汉学”之分。^①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当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也不能说决不会产生“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外人的褒贬评鉴,有时或许正是一块“他山之石”。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选题的角度,他们处理问

题的方式，他们的评价标准，无不反馈出另外一种文化背景。“横看成岭侧成峰”，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探讨古老而又常青的中华文明，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将推动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有益于在一种综合东西文化基础上的世界文明的建设。

中国学术界已日益重视外国对中国的研究。许多学术杂志腾出一定篇幅，介绍国外的中国学研究动态，几家出版社还出版了海外汉学研究丛书。这都是很好的现象。一般来说，所介绍的情况以日本的为多，欧美的为少；欧美中以美国的为多，欧洲的为少，欧洲以法国的为多，德国的为少。看来在介绍西方对中国的研究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应德国洪堡基金会 (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 的邀请，本人从 1989 年到德国各地访学，访问了包括汉堡大学、波恩大学、哥廷根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洪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波鸿大学、海德堡大学、特里尔大学等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设有汉学系的德国大学，同德国同行们进行会谈、讨论、交流，参加他们的学术报告会，阅读他们的研究论文，还应聘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文史课程，因而对德国的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有所了解。多谢《文史知识》编辑部的美意，使我得以把自己的了解与印象写出来，以广见闻，以利交流。写作中得到许多德国学者、教授、朋友的帮助，谨此致以谢忱。

介绍德语国家汉学以前，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西方汉学走过的道路。

(二)

1991年是马可波罗从广州海路离华700周年。西方人之了解东方，了解中国，马可波罗功不可没。这位威尼斯人关于东方见闻绘声绘色的描述，使欧罗巴人将信将疑之际，生出无限幻想。据说500年前鼎鼎大名的哥伦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的激励，毅然率领船队往东方去寻找丝绸与金玉遍地的海外“仙山”——印度和中国的，结果找到了美洲新大陆。

马可波罗本人其实也是在东西方交往已甚频繁的背景下来华的。十三世纪的欧洲，正值十字军东征的年代，东方蒙古人的西征，使西欧生出一个“远交近攻”的策略。他们企图一方面遏制蒙古西进，另一方面与之相联络通好，夹击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首先由教皇英诺森四世出面，于1246年派教士出使蒙古，几年后，法皇路易九世也遣使节到蒙古帐下，均不得要领而回。倔强的蒙古铁骑一直冲到了地中海岸。终元之世，西方商人与教士来华，一直络绎于途，马可波罗一家就是其中之一。只是从十四世纪末开始，由于伊斯兰教国家的崛起，中国与欧洲的直接交往一度趋于沉寂。^②

十五世纪末是世界航海史上最辉煌的时代。非洲好望角的绕航，美洲的发现和欧亚航道的开通，直接促进了东西方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

1543年，亦即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天主教耶稣会成立。这时的欧洲笼罩着一股宗教狂热的气氛，耶稣会士们精神勃勃，想把他们的上帝信仰也推广到亚洲，于是就有了明末清初传

教士的东来，就有了“西学东渐”。

在华建立耶稣会的是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神甫。利玛窦于万历十一年到达澳门，后来又在广东的肇庆、韶州等地逗留。在澳门他已学会了汉语，能说会写。罗常培先生《国音字母演进史》提到利玛窦还曾设计了一套“汉语拼音方案”，用拉丁文字母拼读汉字。到北京后，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接近中国士大夫，穿儒服，讲汉语，在给中国人洗礼传教之前，首先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洗礼。他们把西学介绍给中国，又把儒学和中国的情况介绍到欧洲。据著名汉学家、蒂宾根大学前副校长葛林(Thilemann Grimm)教授统计，^③ 十七世纪欧洲至少有四种有关中国的书籍极为畅销。其中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教士最早的在华旅行报告，截止1663年78年间共有七种不同语言的版本，行销达28版；1615年出版的《利玛窦日记》33年间有六种语言的版本，发行12版；1641年葡萄牙人关于在华教会的报告，37年内共有五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发行9版；特别是卫匡国(Martin Martini)关于满洲入关即所谓“鞑靼战争”(1644—1645)的记述，在1654年出版后，50余年间共被译成九种不同的语言，发行达21版。此外单单十七世纪下半叶(1650—1700)在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的重要著作，除了零星报告和信函不计外，就不下38种之多。因此十七世纪的欧洲确实刮起了一股“中国风”，耶稣会传教士就是当时的“兴风”者。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皇帝颁布上谕，准许耶稣会教士行动自由，这样做，康熙自有他康熙的意图，但却使他在西方的崇拜者那里赢得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的不虞之誉。

毫无疑问，传教士是在教会的利益原则下介绍中国，研究儒家经典的。利玛窦就极其认真地在中国经典中找到了“上帝”的概念。他们极力想向欧洲证明，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早就受到过上帝的关怀，他们现在做的正是重建上帝信仰的工作。但是中国人崇天祭祖，却是与基督教义迥然有别的。于是就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礼俗的研究，仅 1700 年内就发表了七部研究中国礼俗的著作，如《中国礼俗政治档案》、《中国礼俗政治讨论》等。由于有关中国教徒应否保持其偶像崇拜的争论，就进一步引起欧洲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字的注意。人们研究中国民族是否与《圣经》里所提及的民族在历史上有过来往？研究中国文字是否与埃及的象形文字有关？进一步人们希望通过此类研究找到中国古代对上帝信仰的蛛丝马迹。十六、十七世纪欧洲最早的一批汉学家就是这样地在这批人中间产生的。

1701 年，耶稣会北京地区负责人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公开发表言论，认为儒家的“天”乃取法自然，并非最高神祇上帝。于是爆发了一场所谓“礼仪之争”。1704 年，教廷宣布禁止中国教徒祭祀孔子和祖先。1705 年和 1720 年教皇两次派人到北京就此事进行交涉。中国皇帝当然不能接受。康熙一怒之下，禁止耶稣会在中国传教。教皇也于 1773 年下令解散耶稣会。传教士时代的汉学蜜月也就寿终正寝了。但是由此传播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却不会在欧洲大陆消逝。^④ 福赫伯赞叹：“当时欧洲对中国的兴趣是如此之大。”以致人们可以说，那种反巴洛克(Barock)的罗柯柯(Rococo)风格完全是一种中国模式。罗柯柯是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十八世纪中

期欧洲风靡一时的一种艺术风格，表现在绘画、建筑、园林以至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深受中国文化与艺术的影响，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高扬理性主义的旗帜，反对宗教愚昧，也从中国思想家那里寻求理论武器。他们把宋儒理学中的“礼”解释为自然原则，看成是对基督教启示神学的反动。如伏尔泰十分推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不语怪力乱神”、“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说：“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得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虚玄。”他作诗赞美孔子：“他使世人不惑，启发了人心。他说圣人之道，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⑤包含着对基督教神学的讥讽。如果说十七世纪的欧洲汉学受到基督教精神的驱动的话，那么十八世纪的欧洲哲人对中国学的热诚则笼罩在一种反基督教的气氛之中。

与十八世纪对中国的狂热相反，十九世纪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1776年至1814年原在华耶稣教士冯秉正(Moye de Mailla)出版了16册的《中国通史》。这部依据《通鉴纲目》编译的编年史书，只有朝代的更替，而没有历史的发展。德国科协前副主席、著名汉学家福赫伯(Herbert Franke)教授在《西方汉学的历史》^⑥一文中说：“整个十九世纪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和它的文化是静止的。虽然有数千年的高度文明，但是没有什么变化。从根本上说，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冯秉正这本书。赫尔德(Herder)、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深受其影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了大门，现实政治和商业利益的需要，使欧洲各国普遍设置了中文教学课程。西方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和学者不

断涌进中国。其中一些人回国后在大学潜心研究汉学，成为著名学者，如牛津大学的理雅各教授，剑桥大学的威妥玛教授等。所以欧洲学者普遍认为，与十八世纪浪漫的汉学相比，十九世纪汉学方才在欧洲真正作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建立起来。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发现引起举世瞩目。殷墟甲骨、敦煌吐鲁番文物吸引了西方大批冒险家、学者前来“探宝”，给二十世纪的欧洲东方学界的中国学研究以进一步的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新的发展。1948年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一次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是经历战争磨难后欧洲汉学界的新生代重整旗鼓的尝试。1965年它改名“欧洲汉学家协会”，成为一个全欧性的学术组织，五十、六十年代欧洲“宋代研究计划”的实施和“汉学研究文摘”的编纂就是西欧汉学家联合美国及日本等国学者进行的合作。七十年代以后，由于中欧关系的改善，特别是港台经济的起飞和七十年代末大陆的改革开放，中国（包括港台）与西欧的贸易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刺激了欧洲各国大学中文教育，也推动了汉学研究，在亚（日本、朝鲜等）美（美、加等）欧海外汉学研究格局中，欧洲继续保持其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传统地位。

（三）

在欧洲汉学传统中，德国的汉学研究就跟它曲折的历史一样，起步晚，起伏大，发展快；德国的汉学也和德国的现状一

样,因其雄居西欧各国之首的经济实力而显得规模大,势力雄厚;德国的汉学还同灿烂的德国文化一样,富于成果而且深具特色。

关于德国汉学的介绍,我想分成如下几个部分:

一、引言

二、传教士时代的德国汉学

三、筚路蓝缕的先驱——十九世纪的德国汉学

四、世纪之交的转折——德国汉学学科的建立

五、卫礼贤和法兰克福“中国学社”

六、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福兰阁和佛尔克

七、土生土长的“莱比锡学派”——孔拉迪及其弟子们

八、大墙外的汉学家——查赫和库恩

九、从柏林到北京——西来取经与东行求法

十、战后的残局与汉学的重建

十一、从“三分天下”到“诸侯称霸”——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德国汉学

十二、“中国热”时代的汉学

十三、今日大学的汉学系

前面十章谈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发展,力图讲明汉学在德国走过的曲折路程,介绍各个时期有影响的德语国家的汉学家和他们的代表作。最后三章介绍德语国家汉学的现状。特别是比较详细地介绍九十年代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大学汉学系和研究所关于中国学的教学与研究的状况。包括教研人员、课程安排、图书设备、研究课题与重点,主要研究成果等等。叙述中难免挂一漏万,尚祈读者雅正。

① “汉学”与“中国学”的涵义严格地说并不完全一样。中国学应包括汉族之外其它中国少数民族的学科。但在西方传统分类中藏学归于印度学或南亚学，蒙古学归于中亚学，为了行文的方便，在本文中“汉学”与“中国学”的涵义不作区分。

鉴于奥地利和瑞士同属德语区国家，本文在介绍德国汉学的同时亦附带兼及之。

② 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第3册，台北，1958年。

③ 葛林：《中国与莱布尼兹的中国观》，李国祁译，载《食货》复刊号第1期，第516页。

④ Raymond Dawson: *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35—64. (道森：《欧洲接受中国文明的分析》)

⑤ 参见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2—293页。

⑥ Herbert Franke, *Zur Geschichte der Westlichen Sinologie*, in: *Forschung u. Information—China*, Berlin (1980); *Colloquium Verlag*, S. 9—16. (福赫伯：《西方汉学的历史》)